

导 论

重 塑 中 国 魂

人有人魂，国有国魂，国魂是人魂的总和，人魂集结为国魂。人魂和国魂，也就是文化，是价值观、思想和道德。个体人的行为，要受文化的支使和制约，以国为总体的人的行为，也要在一定文化的指引和制约下进行。现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进程中。中国为什么要变革，变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我们又将如何进行变革？

这些问题，是经济的，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为了使中国的变革与人类总体大趋势相一致，同时又注意中国的民族性特点，我们必须认真地反思旧有的文化，创建新的文化。其核心和实质，就是确立与现代人类总体文化相统一的现代中国文化，也就是重塑中国魂。

中国曾有过辉煌的国魂，它是两千余年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立于天下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古代中国文化。它聚而为系统的概念体系，散而为官与民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它内存于亿万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外化为各种典章制度；它凝合了亿万中国人，贯穿于人们的社会生活

和社会结构；它使中国人确立了基本的精神和规范，它在世代延续中存留。这是中华民族文明发达并领先于全人类的标志和重要因素，既是我们祖先们的骄傲，也是留给我们这些后人的遗产和包袱。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守性——它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并以对商业的抑制而阻挡从农业向工业的变革，以官僚政治阻挡民主政治的发生，中国社会自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虽有政权的更换，并无制度和结构的变革。而到近代，西方国家在其资本化的灵魂，亦即资本主义文化的指引下迅速发展经济 变革政治 摆脱落后，并很快超过曾让西方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国，进而侵略、欺凌中国人，迫使中国人皈依其文化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才意识到自己不仅有亡国亡种的危险，还有亡魂的可能。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经济、政治制度进行批判，进而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这是一个痛苦的历程。失落、彷徨、求索、奋进、创新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 中国无数的先进分子，艰难地探索着，斗争着。这是文化的革命，其成就也是巨大的。我们引入、借鉴了西方文化的合理部分，并对古代中国文化进行了验证和分析。这是非常必要的一环，也是重塑中国魂的必经阶段。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在对前一阶段文化革命全面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创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和主体的现代中国文化，同时对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做必要的批判、改造和借鉴的工作。

一、“我”是什么？

说中国现代化，说重塑中国魂，似乎很空泛——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然而 这正是“我”的问题。

敢问读者诸君 谁个能说明白“我”是什么？

“我”，是人类用以表示自己个体存在的一个词，不论哪种语言都必有一个“我”不论哪个人都是“我”。“我”是生命的直接体现；“我”是存在的主体。不论“我”幼稚或苍老，不论“我”高贵或低贱，不论“我”贫穷或富裕；“我”都是“世界”的一个方面，与“我”相对的一切，都是客体。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就构成社会行为和关系的基本矛盾，也是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出发点。

世界上所有的个人都是“我”。正是由于“我”的存在才有了社会，有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有了“我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我是什么？”这个自人类出现就一直困惑所有人的问题是个永恒性问题。

所有人都在想这个问题，每时每刻都想它；所有的思想家都是力求从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解答这个问题。尽管答案有无数种——几乎所有的人都最有权利和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却未能有一个公认的答案，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依然对“我是什么”感到困惑。这是永恒性问题。它以无尽的魅力，吸引着思想家，也吸引着普通人。

然而，这个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恰恰又是最容易使人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在谈论各种社会问题时，人们往往表现出“忘我”的态度。似乎是以全人类、或国家、或阶级的代表来说话，而“我”是不存在的，或者不是从“我”立论的。

现实的人们，在那里大谈各种社会和自然界的矛盾，为它们而担心，为它们而困惑。谈人类的命运，谈中国的前途，谈经济，谈政治，谈文化，谈现代化，谈传统，谈历史，谈现实，谈社会主义，谈资本主义，谈家人，谈邻居，谈单位，谈领导，谈同事，谈……

常见到一些人在那里争论：共产主义是否空想？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中国的改革应当朝哪个方向演进？

这些似乎都是“我”之外的问题。当争论不可开交，当议论得不出结果时，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管它呢，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四川新都宝光寺中何元普撰的对联的下联“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大概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的。

可是这一切又都正是“我”的问题。不然，“我”怎么会想它，说它，做它？这是所有的“我”应正视，也必须正视的问题。只有弄清“我是什么”，明确“我”的位置和关系，才能真正地、切实地考虑各种社会问题，才能做事和待人。

当郑板桥以他那独特的书法写下“难得糊涂”四个字时，他内心最深刻的体验，是面对客体的无奈，也包含着由于对自我的推崇而导致的对主体的无知。当今天那么多人把这四个字作为座右铭悬挂于陋屋或雅室时，他们的心境是什么？是对外界，对他人的不满、蔑视、仇恨？抑或是对自我的崇拜？大概几方面都有。但所有感叹“难得糊涂”的人，又都有各自“我”的不同情绪。从字面上看，“难得糊涂”是以我为出发点，是对自我的高尚情操和超凡智慧的无限崇拜，并由此而对外界、他人的不满和消极抵御。自称“把一切都看透了”的圣者贤人，在我们中间确实不少。当这些人抒发其至理名言时，恰有一个共同点：在为自己生得或学得如此高明而懊悔时，他仅仅忽略了一点：我是什么？

与那些因明白而“难得糊涂”的人相反，人群中还有相当一批人因糊涂而“难得明白”。如果说“难得糊涂”者的聪明表现于避世，而“难得明白”者却努力参与世事。现在，总会看到一些人想方设法为中国的改革提出种种方案，他们有种种样样的外来的理论依据，此主义，彼原理，还有样样种种的国外的事实根据，说美论欧，谈日以至于“四小龙”。总之，依靠外国人的理论与实践，给中国设计发展模式和政策建议，不仅振振有词，而且大义凛然：为国家，为民族。然而，他们对外国、对中国又明白了多少？这从其观点的反复无常就可看出来。他们说了那样多的大计谋，然而，却唯

独不说：“我是什么？”

当社会上的某些人，在那里非常负责地谈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要社会主义，不能要公有制，只有私有化才能发展生产力时，他们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总体的思想代表。这种人在学术界比较多，我的朋友和同事，乃至学生中，就有不少以此立论，并引以为“发明”和“真理”。他们有许多理论与实际的论据，最拿手的就是以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经济水平与某些外国相对比。而当我与他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首先提的问题，还是这个“我是什么？”——不幸得很，这些被问者几乎没有一人能回答。于是我跟他们说：咱们还是先弄清，起码是多想一想“我是什么？”

任何人都是一个个体，“我”既是其存在的方式，也是其对存在的意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就是“我”的世界，就是“我”的生存。

“我”作为一个生命体，是独立的，但同时又是与总体的类相统一的。个体的我与我的总体，这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矛盾。

“我”的存在，首要的一点，就是生命。生命的各要素，是有机结合的。维持生命，需要各种必要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更要通过社会的联系才能得到。“我”的生命力，是以各种生的欲望表现出来的，这也可以称之为“需要”。需要是个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但人与动物不同，人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质条件，要通过劳动才能取得。劳动已成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个体劳动的社会联合，不仅是劳动的主要条件，也使个体之间形成了交往。交往是多方面的，“我”在交往中存在并相互交流。因此，也就产生了意识。意识不仅是对社会、对外界的认识，也是对“我”的内在思考。

需要、劳动、交往、意识四要素，是个体的人与总体的人类所具有的基本因素，它们是内在统一的。“我”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也就是这四要素的有机结合。其中，劳动是核心，也是聚结其他要素的主体。

“我”是所有个体对自己存在与意识的抽象认识，同时也是具体而实在的感受。

“我”是利益的存在。“我”的欲求或需要是利益的基本，但“我”作为社会一员，利益绝不仅仅是满足各种物质的需要，它还包括情感、精神、社会承认等方面。要弄清“我是什么？”首先就得明白我的利益。而利益并不等于幻觉和臆想，利益作为一种社会的规定，它必须与“我”现实的能力和社会地位等等相统一。

“我”是价值的存在。价值就是个体人的社会功用与社会承认的总和。“我”作为一个人，有着基本的劳动能力。而经过努力和训练，个体人之间的劳动能力又会有相当大的差异。除了这种能力上的差异，还有社会作用方面的差异，或是由于社会条件，或是由于个人努力程度，个体在社会作用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这是“我”的价值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则在社会总体，个体的作用如何被社会所承认，以及承认的程度，又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所以，“我”作为价值的存在，与作为利益的存在一样，都是不能脱离社会总体的。

“我”是社会存在。个体的我只能是社会总体的一元素、一细胞，我在社会总体中的存在，只有在社会总体中才有我的存在。人类社会是个系统，就像个体人的存在是个系统一样。社会大系统中的各种要素，都分别存在于其结构之上。社会结构分为若干层次和部分，它们有机地组合、内在地统一着。个体的我只能分处其中某一层次和部分，即便有所变换，仍然处于其中某一层次和部分。一个细胞脱离了机体，不能存活；一个人脱离了社会，也不能生存。我的利益、我的价值，都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

“我”是国度和民族的存在。国度性是社会性中的重要方面，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度性不仅是一个地域范畴，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范畴。国度把人类界分为若干群体，国别是人与人的差别之一。不同的

国，也就有了不同的“我”。国度性往往与民族性密切相关，但二者也有区别。民族或大于国度，或小于国度。随着时代的进展，以及国度的限制，民族性对于人的制约，更多地体现于文化和语言、艺术等方面。现今的“我”不仅是国度的，也是民族的。

“我”是职业和阶级的存在。社会结构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分工，二是阶级。相比之下，分工早于阶级。阶级是人类社会在一定阶段的产物。现在人类依然处于阶级社会阶段。“我”的个体存在，必须从属于社会分工所形成的职业，从事特定的劳动，并由此而取得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说职业只是个体人生命某一时期的归属，那么阶级则伴随着个体人全部的生命。职业关系个体我的价值，阶级则制约着个体我的利益。想我、说我，总离不开职业（包括将要从事的和曾经从事的）和阶级。

“我”是意识的存在。人的社会性集中体现于意识上。意识是社会总体历史的产物，而我同样也是历史的产物。我作为一个个体，面对着整个自然界，面对着整个人类总体。这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我”之所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以主体的意识与自然和社会的总体相对立，就在于自然与社会各种现象通过我的感官而集合于我的大脑。当我用尽全力在想“我”时，所想到的恰恰是我周围的人和物，以及我身上的器官。而“我”就是这些么？但我确实是存在的。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就是由此而发。当我的思想怀疑甚至否定了“我”的存在时，思想本身却又出来否定它的结论，我能思想，就证明我的存在，而思想本身，又正是“我”的。我还可以进一步去思想，去感知，去活动，以证明和表示我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又使我融入社会总体，去与自然界发生关系。

“我”是文化的存在。我有需要，能劳动，会交往，有意识，这些方面的综合，似乎足可以构成一个“我”。但作为“我”还要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文化。文化是“我”作为人的重要标志，它从广义上说，可以归属于意识，是意识中有关价值观、思想与道德的集中

表现。也正因此，文化成为我与社会，与他人交往的基本依据和准则。文化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正是在文化上，体现出我与总体的统一。我的文化来自社会，我是文化了的我；我的文化又作用于社会，影响社会的文化，社会是由众多文化的我所构成的。我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支配下进行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又会进一步从社会的文化中受到影响和制约，从而改变和丰富我的文化；与此同时，我思想和行为中的文化，又必然对社会总体发生作用，从而又以内在的机制，来改变和丰富社会文化。

“我”就是上述几个方面的总和。

或许，你读过上述文字以后，还不能明确“我是什么”这个命题。是的，“我”是一个活生生的机体，有着具体而丰富的内容。我们在这里只是就思考、回答“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出了方法上、原则上的几个要点，而具体的回答，则要以具体的“我”自己做出。

“我”是思想的主体，“我”所研究的各种问题，都是“我”的问题，是令我困惑和感兴趣的问题，是与我的利益、价值、社会、国度、民族、职业、阶级、意识、文化等直接统一的问题。当“我”不去考虑、研究这些问题时，它们是外在的，而当“我”真正把它们作为问题来研究时，它们就是内在于“我”的问题了。正是在对社会的研究中，我已经把对象“我”化，同时把“我”对象化、社会化。因此，在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现代化时，先把“我是什么”作为论述的始点——这也是我们探究这个作为“我”的重要问题的始点。

二、中国的我 我的中国

在回答我所提出的“我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人中，说得最多的，也几乎不加思索的话，第一句是：“我是人”。第二句是：“我是中国人。”

我是人 我是中国人。

这是多么简单的也是概念性的回答。然而，当我再进一步问：“中国是什么”的时候，回答又呈纷纭。

中国是个地域范畴。不论从地图或地球仪上，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它的位置。在地理学上，中国是有许多内容的。经度、纬度，气候、矿藏、植被、河流、山脉、区划、人口……都是中国地域存在的因素，而中国人就是存在于这个地域之上的，我也在其中。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存在。在中国的版图上，生存着五十多个民族。“我是中国人”再进一步说就是“我是中国某族人”。五十多个民族中，有的只限于中国地域，有的则是跨国度的民族。我是中国的某族人，不仅界定了国度性，而且界定了民族性。

中国是经济的存在。中国是一个经济实体，它的生存和发展，是以全体国民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为基础的。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构成经济的大系统，每个中国人都在这个系统中存在，并赖这个系统的运作而存在。经济矛盾，经济发展的程度，与中国人息息相关。

中国是政治的存在。政治是对人间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调解与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政治的这种作用，表现为阶级的统治。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器，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被统治阶级。这种统治以法律和暴力、说教、舆论等各种方式存在。被统治阶级在不堪忍受压迫时，会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斗争。每个中国人都处于中国的政治关系中。政治制度界定着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矛盾也是人际关系中重要的矛盾。不管愿意与否，“我”都必须正视中国的政治。

中国是文明的存在。文明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它是人的劳动和意识的产物，是人类交往和社会关系的条件和基础。中国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的光荣和昌盛，不仅造福于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的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我”所面对的、我所赖以生存的，就是已经文明了的中国的中国。中国的文明是“我”的营养源，

也是“我”作用和价值的表现场所。中国文明养育了“我”，“我”的生命意义又在于充实和发展中国文明。

中国是社会制度的存在。制度是对人际关系的相对确定和长期的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它是在特定文明条件下，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我”随时都受制度的制约，以至在我的观念和行为中，也表现出各种制度的规范。制度是无形的，又是实在的。“中国”正是以制度的形式，作用于每个中国人，中国人也是以对制度的认可与遵循，才能体会到中国的实在。

中国是社会结构的存在。一个国家，就是特定区域生存的人群的集合体。不论人群中的个体是否愿意，他们都是这一国家的国民。众多的人，男女、老幼，各式各样，错综复杂，但各有其位处，有所由，有所以，有所归。在制度的界定下，社会分为不同的职业和阶级，形成基本的社会结构。这是在特定文明发展水平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形式。“我”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细胞，由结构而与总的机体相统一。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结构，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这一结构中生存。职业、阶级、家庭、产业、人口等结构，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必要方面，而“我”作为中国的国民，又通过社会结构与其他国民，与中国密切统一着。

中国是历史的存在。中国的文明，中国的制度，中国的社会结构，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在世代延续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个过程，也是必要的记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由传说到文字记载，中国已有几万年历史，而明确的史料记载，也有几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而且创造了与这种文明条件相适合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从而使中国在不断的战乱和朝代更替中存续下来。也正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才有了现今的“我”，而“我”在思考中国时，也不仅是它的今天，还包括它的历史。历史的中国，中国的历史，也就是“我”的历史。

中国是文化的存在。不论天涯海角，还是峻岭高山；不论穷乡僻壤，还是繁华都市，不论身在故土，还是客居他乡，不论贫穷，还是富贵，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左右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我是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起来，最为重要的，也是集合性的原因，就是文化。文化是文明中的一个要素，它集中表现为价值观、思想和道德。文化是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凝结和概括，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精神或灵魂的集中体现。文化不仅存在于经典，更存在于每个人的观念中，贯彻于每个人的行为中。中国文化，是人类中形成最早，且保持得最为久远的文化。它的早熟和系统、深刻，是所有其他古代文化不可比拟的，这是中国领先于世的重要原因。而近代中国的落后，也与古代文化的保守性密切相关。文化的作用是无形的，又是无所不在的，每一个中国人，从生到死，都笼罩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中国文化制约了中国人，也造就了中国人。

中国是一个综合体，上述几方面的存在，是中国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它们是内在统一的，并由此而构成中国的主体，围绕这个主体，其他各种因素也都凝聚起来，形成作为“我”的个体存在的总体环境和必要条件。“我”——中国的国民，就是在这个总体环境中生成的。“我”是中国人，中国的“我”。而要认知“我是什么”，就必须对“我”的总体存在——中国进行全面了解。在“我”的身上和意识中，集合了总体中国的各方面因素。

“我”是中国的，中国也是“我”的。

“我们的大中国，好大一个家。”这句流行歌曲，唱出了一个真理：中国是“我”们的。汉字的“们”由“门”和“人”构成，门中人，也就是家人，自己人。

古代有一句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中国是“我”——所有的匹夫的。

在一个个相对独立存在的“我”中，聚合了总体中国的各要素

也正是由个体“我”的总和才构成了总体的中国。

就像平常人们不大注意“中国的我”一样，平常人们也不多想“我的中国”。

或许还有人会提出疑问说“中国的我”是可以成立的，而说“我的中国”就难以让人信服。中国那么大，怎么就是“我”的？

然而，只要到某种特殊时刻，“我的中国”这一观念就会显现出来，而且会为绝大多数“中国的我”所认可。当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国土受到侵略时，“我”会感到自己权利的被侵犯，我的身体和意志受到宰割；当举行某种吸引人的国际比赛时，运动场上的激烈竞争，会使“我”与中国的运动员一样兴奋；“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这是在为我的中国奋争。

其实，当我们认真地讨论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讨论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时，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中国是我的，我要为它负责。

我们现在是认真地、专门地、系统地探讨中国现代化中的重要方面——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的中国”这一观念，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本书作者与大多数读者，都是“中国的我”。当我们由某种机缘结合起来，共同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课题时，不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以及思维方式，还是所探讨的内容，都是源于“中国”。正是由于我们是“中国的我”，才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文化，就是“我”的文化，是我的灵魂。

明确“我的中国”对于我们的研究，首要的一点就是明确责任心。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外人的事，它正是“我”的事，是“我”的发展，是“我”的现代化。“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个体的我，都有一个内生的要求发展、要求进步的趋向。虽说不同的人对于发展和进步的观念会有不同，但从总体上说，人的意识取决于人的社会存在，个体人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取决于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总体文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与人类

总体大趋势相一致，与中国经济、政治现代化相统一的。个体的“我”会很清楚自己的利益和价值与中国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联系，也会自觉地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个体“我”的观念变化的总体概括。当然，中国文化现代化要有一系列的文化概念，并由此构成一个体系，它所依据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与人类总趋势相一致的意志。对于我们来说，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路，也就是改变自己的旧观念，确立与人类大趋势及大多数中国人的意志相统一的新观念。“我”的文化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是一致的。

其次就是树立信心。“我”只是一个人，“我”的观念变化，“我”的研究怎样才能与中国总体的文化现代化相统一或者说，怎样才能以个体的研究促进总体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我”有这种能力吗？这种怀疑是每个研究者都会有的。我本人也常有这种疑虑。可是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又发现任何一种文化，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也必然是从个体人观念的变化开始的，并都是若干个体人以其不懈努力来促成的。释迦牟尼创佛教文化，耶稣创基督教文化，马克思创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各文化流派在其演化中的关键性人物，都是如此。中国儒家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与其创始人孔丘的艰苦努力直接相关。儒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一套“内圣成德”功夫正是以对“我”的修炼以成“外王事功”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后世儒家代表人物也都以其对自己观念的修炼与系统，发展了儒家文化。总体的社会文化是个体文化观念的集合，个体文化观念又是总体社会文化的表现。当“我”在思考“我”的观念时，其内容恰恰是社会总体观念。而当“我”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进行专门研究时，“我”所研究的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总体。这种研究当然需要“我”本人的诚意尽心，也在研究中改变和升华我的观念，同时也必然把“我”观念的变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相统一。“我”的意志和意向，也要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趋向相一致。这样，只要“我”们认真、负责地进行研究，其结果也必然会通过相应的社会机制，而影响他人，从而汇入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大潮中去。

第三，就是确定研究的立场、方法和方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研究，主体内容就是对现代中国文化矛盾的综合和分析，目的则是从对矛盾的规定中，发现其演化的趋向，并提出为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而采取的方案和措施。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遵循什么方向进行研究，是这项工作中相当重要的因素。“我的中国”与“中国的我”相统一，是确定研究立场的必要前提。“我”是站在中国人总体的立场上，来从事文化现代化研究的。“中国人的总体”是应当分析的，是从发展的角度，对现代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即广大文明主体的利益进行总体归纳而确定的。而研究的方法，首要的，就是对文明主体意志的总结和概括。中国古代的文化，是以少数统治者的意志为依据、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以大多数文明主体的意志为依据和主导。现代化的中国文化，就是对作为文明主体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意识进行概括。“我”也是文明主体的一员，“中国的我”和“我的中国”实际上也是“我”作为文明主体的一员，而遵循文明主体的意志，并对这意志进行总结、概括的依据。对文明主体意志的概括，是立场所规定的方法的出发点。由此“我”所能选择的方法，就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系统抽象法，这是马克思作为人类第一个文明主体的大思想家所创立并成功地运用的方法。当然，在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时，还应将马克思的方法原则具体化，并进行必要的创新和发展。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方向，与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是统一的。只要我们认真地总结和概括中国文明主体的意志，并将这种总结和概括与全世界文明主体的共同意志及其发展趋向统一起来，就能确定并把握研究的方向。

第四，就是能够对研究的成果进行科学的检验。“我”是站在

中国现代文明主体的立场上，对他们（也包括我的）的意志进行理论概括的“我”的研究成果既是“我”的，也是中国文明主体的。在这里，“我”的利益就是如何更为全面、准确地概括中国文明主体的意志，从而实现“我”作为文明主体一员的价值。研究是一个过程，文化研究也是如此，不可能一下子就得出完满的结论。或是由于方法，或是由于材料占有的程度，都可能在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我们看到的学术界的争论，往往是因此引起的。如果把“我”孤立起来，“我”的利益仅限于个体的名誉和地位，就会固守某些带有明显缺陷的结论，不听取别人意见，不去进一步克服缺陷。但当“我”已经将个体与总体统一起来，“我”的利益和价值不在“我”个体而在总体，在于能否切实反映文明主体的意志时，“我”就可以负责地检验研究的结论，进而反思研究的方法和过程，克服缺陷。而检验的依据，又是中国文明主体的利益和意志，是人类总体的大趋势。

三、文化的中国 文化的我

文化是经济、政治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历史的发展，既有物质条件的存留和演化，更以文化的变革和延续表现出来。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续；现代中国人所意识到的中国历史，除长城、故宫、庙宇、坟墓、各种文物之外，更多的是书籍、绘画、书法、文字等等。尤其重要的是，留传于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以及风俗、习惯。

当我们闭门静思中国这个主体，当我们在异国他乡怀念中国，此时我们所能想到，或能以概念性语言表述的，恰恰是中国的文化。当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上的一般性越来越普及时，国与国之间的特殊性，往往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的差异上。当几位跨国的留学生同学一个专业，他们的相同处是很多的，但谁个又都清楚自己与别人的国度性。这时，文化的国度性与文化对个人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

中国的文化，是历史的中国人创造并发展的，是中国经济、政治以及语言、艺术等发展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这些领域得以演进的内在因素。不论经济、政治，还是语言、艺术等，都是由人从事的，是由具有一定价值观、思想和道德的个人以自己的观念和意志注入其中的。经济和政治，都是由矛盾构成，并在矛盾的斗争中发展的。这些矛盾中的因素之一——就是人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它与人的利益相统一、相制约，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的演化。而语言和艺术，则更明显地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也经语言、艺术而流布和传留。

不论人从事何种活动，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支配下进行的，都受一定社会思想和观念的制约，都要依循一定的道德规范。文化既是一个社会总体存在和活动的必要因素，也是个体人行动的重要内容。人之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化。文化是与劳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是劳动本身的重要成分，而劳动又必然体现出其文化性质。

当我们对人类总体进行考察时，我们会发现，人这个动物的类，与其他动物的类的重要区别，一是劳动，二是文化。文化和劳动一样，是人的类活动和类本质的表现。人类的文化，文化的人类，是有其普遍同一性的，这在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对比时，是相当明显的。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普遍性，才使人类有了认同感。不论是地球的哪个角落，也不论哪个种族、哪种语言、哪种肤色，只要相遇，都会首先产生一个明确的感觉：对方和我一样，也是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相互间交往的广度和频率都大为增加，其文化的普遍性也日益显现。联合国大楼中各国使者在一起办公，奥运会赛场上全世界的选手共同向人类体能的极限挑战。这种场面，充分地显示了人类文化的普遍性。

人类是伟大的，而人类的伟大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文化。是文

化将人类内在地联结在一起，是文化促使人不断地发展、壮大。文化的普遍性是人类相互制约、促进的重要条件，而人类的进步又不断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一样，文化不仅有其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基础，同时也受普遍性的制约。

文化特殊性的主要表现，就是国度性和民族性，这是长期历史过程所决定的。文化的特殊性并不排斥文化的普遍性，不同国度和民族的文化是在相互交往中不断地融合和影响的。不仅特殊文化中体现着文化的一般，而且各特殊文化在一般性的制约下，也在互相渗透。演化到现代，所谓纯粹的国度文化和民族文化已是不存在的了。但文化的特殊性并未因此而消失。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度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也就必然存在。

中国作为一个有久远历史的大国，其文化不仅深远、宏大，而且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矛盾，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我们今天说“中国文化”时，可曾想过，在历史上是由多少个“国”和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才逐步地形成了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自豪和自负的中国文化！而且，它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吸纳了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因素。从印度的佛教，到欧洲的基督教，再到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都对古代中国文化有过重要影响；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等，在一定意义上说，则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相当重要的促进因素，并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为中国人所消化、理解，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必要成分之一了。

生活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类，自古以来就是在“中国文化”这个充满了内在与外在矛盾、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利益和意识，乃至不同“国家”与民族利益与意识相互对立和制约的总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休养生息，繁衍并争斗至今。从日常的衣食住用，到高层的政治矛盾和学术论争；从言行举止，到战场上的拼斗；从婚丧育抚，到节庆礼典，处处体现着中国文化的作用，时时表现出中国